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最高军事学府。从1936年6月创建到1945年9月抗战胜利，“抗大”累计培养10多万名军事和政治干部，为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被誉为“革命熔炉”。作为“革命熔炉”中的思想阵地，“抗大”图书馆肩负传播革命真理、赓续革命火种的重任，将艰苦奋斗、抗日救国的信念烙印于每一位学员的心中，为民族解放事业注入了强大精神力量。

“救亡室”与“流动图书馆”

“抗大”是在政治环境和生活条件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初创时资源匮乏、生活艰苦、条件恶劣，办学过程中时常面临经费不足、教员不足、教材不足的困境。1936年7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抗大”访问，他在《西行漫记》一书中描述：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

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抗大”成立初期也没有正式的图书馆，只是延续中央苏区时的经验，在各大队开辟了“列宁室”。全面抗战爆发后，“列宁室”一般都改称“救亡室”。它以俱乐部的形式组织战士和革命群众有计划地开展各种文体活动，经常开展文艺演出、故事会、演讲比赛等活动，并设有识字班、图书室，屋内张贴领袖画像、海报和宣传品等。1937年8月1日，“抗大”第三期开学不久，全校掀起了建校热潮，各队都建立了“救亡室”，室内放置书报供人阅读。“救亡室”经常开展“读书会”活动。“读书会”通常以三或四人组成一个小组，由一名文化水平较高的同志担任组长，围绕近期需要学习和研究的问题，带领大家阅读讨论。“救亡室”在学员学习上发挥的重要作用得到了广泛认可。1937年12月，毛泽东曾写信庆祝“抗大”九队成立“救亡室”，勉励他们认真学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与方法，救亡图存。

“救亡室”的图书报刊较为匮乏，

部分学员自发组织成立了“流动图书馆”。学员们将个人图书集中起来，进行统一管理，图书既可以在本队内传看，也可与外大队集体交换阅读，有效地促进了图书流通，加强了学员之间的学习交流。1938年6月，罗瑞卿在为纪念“抗大”两周年而写的《“抗大”的过去与现在》一文中专门称赞这种做法，它通过“把学生私人备有的书集合起来，经过合理的分配与调剂，使能找得的参考书籍能够普及到一切需要研读的学员”。其中，最受欢迎的军事学及社会科学类读物，经常“传来传去，总是看得又脏又烂”。“抗大”及其各分校创造的“流动图书馆”是人民军队院校史上最早成立的图书馆，为日后军队院校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抗大”总校与分校图书馆的建设

“抗大”第三期以后，办学规模逐步扩大。经过多方努力，学校建立了专门的图书馆。“抗大”图书馆设在两孔宽敞的西式窑洞里，墙上挂有毛泽东和孙中山的大幅肖像，下方贴有地图。窑洞内沿墙和中间摆放多个四处搜集而来的书架，书架上摆满图书、杂志，书架顶部和阅览桌上有按照年月集中捆在一起的报纸。图书馆的藏书既有大后方寄赠或订购征集来的，也有学校师生员工捐献、向社会募捐

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党的七大确立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短短几年，党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华民族在战胜磨难挑战中浴火重生的鲜明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从自在民族实体走向自觉民族实体的不朽精神丰碑。毛泽东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伟大抗战精神及其体现的抗战文化对于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对于动员、鼓舞全民族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谱写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抵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彻底洗刷了近代以后中国屡遭外来侵略的民族耻辱，极大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也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辟实现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创造了重要条件。”

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伟大建党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伟大抗战精神的孕育形成中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正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书写了气壮

革命熔炉里的知识补给站——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图书馆

□ 梁 姝



“抗大”图书馆一角

收集的。到1939年底，“抗大”图书馆的馆藏已有2万多册。

“抗大”图书馆的所有图书、期刊均编有卡片目录，由专门的目录柜收纳，图书扉页盖有“抗大图书馆”的馆藏章。图书馆的报刊库和阅览室设置在一起，窑洞中间放有阅览桌、条凳和小方凳，供教员和学员到馆内阅读资料，但馆内空间有限，大部分学员阅读的报纸仍由各大队和支队统一分发。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既负责图书借阅管理工作，又进行资料的收集编辑工作，特别是制作专题资料集。工作人员将报纸和内部材料中的专题资

料剪辑下来，按国际问题、时事问题、文化知识等分类整理成册，供大家学习参考，很受欢迎。

除“抗大”总校外，“抗大”各分校的图书馆也在积极发展。如“抗大一分校”在学校组建时即建立了图书馆，图书由组建单位的宣教部门负责提供。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将图书打包，驮在牲口背上行军。向山东转移途中，图书数量不断增加，牲口驮运能力渐显不足，于是发动师生每人分担几本。最终，约有一半的图书是由全校师生亲手带到山东的。“抗大”各分校经常面临行军转移频繁的情况，

为使图书既方便借阅，又能快速收拢转移，学校和图书馆的同志共同研究设计了一种活动书柜，平时展开是书架，行动时合起来即成书箱。书箱与驮架配套衔接，在行进中即可取书放书，轻便易行、灵活自如，这也被亲切地称为“马背上的图书馆”。

“抗大”图书馆还为教学提供了充足的服务，教员和学员经常在馆内阅览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如在“抗大二分校”的图书馆，《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论持久战》等书籍由于存书少、借阅频繁，虽经多次裱糊，字迹斑驳模糊，但仍然是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大家争相借阅。烽火中的图书来之不易，购书有时也要辗转数月，通过层层封锁，跋涉数千里。一旦半路遇袭，即悉数焚毁。尽管条件艰苦、资源匮乏，“抗大”图书馆仍坚持克服种种困难，了解学员需求，积极购买根据地和大后方的图书，为学员提供精神食粮。

“抗大”图书馆在敌后作战期间的发展

1940年春，为适应敌后作战需要，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将“抗大”迁到敌后地区就近培养军政干部。“抗大”东渡黄河后，随即转移到河北邢台县浆水镇继续办学。转移期间，为轻装上阵，图书馆工作人员从原有藏书本中，精心挑选出2万多本军

现了他宁死不屈的铮铮铁骨，表达了甘为革命事业牺牲的坚定信念。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抗战环境中还培育了延安精神、东北抗联精神、太行精神、吕梁精神、沂蒙精神、红岩精神、南泥湾精神、张思德精神等。

伟大抗战精神蕴含着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是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的有机统一

伟大抗战精神是伟大爱国主义精神的具体体现，也蕴含着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毛泽东在为《论持久战》英译本所作序言中指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最终战胜世界法西斯反动势力、壮大世界进步力量、挽救人类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具有重大世界意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进步和反动的决大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在白山黑水间的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七七事变后，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对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共毙伤俘日军150余万人，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伤亡总人数的70%以上。

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巨大贡献。中国作为亚太地区盟军对日作战的重要后方基地，为盟国提供了大量战略物资和军事情报，留下了许多动人的历史瞬间。1942年4月，英军在缅甸仁安羌陷入危机，中国远征军第66军新编第38师主力奉命增援，与日军激战。1944年8月，新四军部队以及民兵群众在江苏建阳县

事、政治及文化科学图书，人背畜驮，翻山越岭，历经千辛万苦，最终在战斗部队的掩护下胜利随校东迁。

这时的图书馆设在当地群众一个院子中，东、西两间大房分别作阅览室和出纳室。工作人员选出20箱约1000册重要参考书籍放在阅览室里供大众阅读，其他大部分图书则被装进木箱运往离镇50多里的大西沟村。这些图书被分为军事、政治、文化科学三大类，军事类分为正规战、游击战和武器教材等；政治类分为革命领袖著作、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问题、军队政治工作等；文化科学类分为文学、小说、历史、地理以及其他书籍等。工作人员做好图书目录后，便将图书放进木箱，木箱上标注图书的起止号，送往距大西沟村10多里路高山上的窑洞。读者需要借书时，先到图书馆查看图书目录，在预借图书登记本上登记，再由工作人员上山取书。山路崎岖险峻、曲折难行，工作人员每周步行往返两次，每次需时三天。

“抗大”图书馆的工作得到了当地群众的极大支持。村里熟悉地形的老人带着图书馆工作人员上山寻找可供藏书的山洞；山上放牧的孩子也会主动监视是否有人进山洞破坏；当发现山洪冲进山洞，有可能会损坏图书时，还会马上派人提醒图书馆工作人员及时检查。敌后作战期间，“抗大”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时刻以战斗姿态开展图书馆建设。在艰苦条件下，为有效传播马列主义、培养教育党的干部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大”因抗战而创建。在这所独一无二“窑洞大学”，图书馆也深刻践行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滋养了一批又一批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人才。烽火硝烟虽已远去，但当前更应继承和发扬“抗大”图书馆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让革命熔炉的火焰代代相传。

（作者单位：中宣部《党建》杂志社）



（上接1版）从抗战全局来看，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在战略上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互相策应。全面抗战初期，国民党采取“以空间换取时间”的策略，以节节抗御的方式进行了淞沪抗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等大的战役，虽然胜少败多，但大量地消耗了日军的实力，众多国民党爱国将士血洒疆场。共产党采取持久抗战，深入敌后，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英勇作战，敌后战场不断发展壮大，抗击着58%—75%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逐渐成为主战场，为赢得抗日战争胜利作出重要贡献。中国人民以顽强奋斗、不怕牺牲、百折不挠的意志战斗到底，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

伟大抗战精神体现着伟大团结精神。民族不团结、人民没有组织起来，是日本军国主义敢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重要原因。抗日战争时期，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族解放为己任，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博大胸襟，倡导并推动建立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引领下，全体中华儿女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打破阶级、地域、党派等的界限，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团结一心，为民族而战，形成了全民抗战的格局。《大公报》一篇文章描述道，“今天南北战场上，是争着死、抢着死，因为大家有绝对的信仰，知道牺牲自己，是换取中华民族子子孙孙万代的独立自由，并且确有把握，一定达到”。抗日战争以前所未有的气势，震撼着人们的心灵，激发起团结御侮的巨大能量。

伟大抗战精神体现着伟大梦想精神。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历史使命。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党指出“这一阶段的革命基本任务，是争取国内和平，停止国内的武装冲突，以便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进一步明确了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即“驱逐日本帝国主义，

（今建湖县）附近，营救了对日作战远航时坠落于此的5名美军飞行员。1941年和1944年，中共中央两次将中共秘密情报人员阎宝航获得的情报通报给苏联，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丰碑上，熔铸着中国人民的卓著功勋。

国际社会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以巨大支持。苏联、美国、英国等反法西斯同盟国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提供了宝贵的人力物力支持。朝鲜、越南、加拿大等国的反法西斯战士直接参加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印度医生柯棣华不远万里来华救死扶伤，法国医生贝熙叶开辟运输药品的自行车“驼峰航线”，德国的拉贝、丹麦的辛德贝格在南京大屠杀中千方百计保护中国难民，英国的林迈可、国际主义战士汉斯·希伯等记者积极报道和宣传中国抗战壮举。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等外国记者，到八路军和新四军等作战地区采访，写出了大量介绍中国抗战的通讯报道。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深刻阐释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内在联系，“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国战场和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巨大贡献，世界各国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有力支援，都是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的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也是世界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团结奋斗、锐意进取，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彼岸奋勇前进。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主任、编审）